



跨 | 文 | 化 | 传 | 播 | 丛 | 书

丛书主编：孙有中

叙事学视阈 中的新闻编译

《参考消息》与美国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

程 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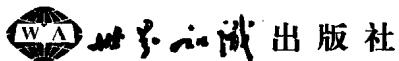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叙事学视阈中的新闻编译

《参考消息》与美国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

程 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学视阈中的新闻编译:《参考消息》与美国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 / 程维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0

(跨文化传播丛书)

ISBN 978 - 7 - 5012 - 4368 - 6

I . ①叙… II . ①程… III . ①新闻报道—编译—比较新闻学—中国、美国

IV . ①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401 号

书名	叙事学视阈中的新闻编译:《参考消息》与美国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 Xushixue Shiyu Zhong de Xinwen Bianyi: 《Cankao Xiaoxi》 yu Meiguo Meiti Beijing Aoyunhui Baodao
作者	程维
责任编辑	柏英
责任出版	刘喆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投稿信箱	guojiwenti@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 毫米 1/16 12 3/4 印张
字 数	236 千
版次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一版 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368 - 6
定 价	32.00 元

**本书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
项目”**

总序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人们政治活动、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正如“全球化”这个歧义横生的词汇一样，因为使用语境的多样性，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远未形成共识。在此，笔者暂且将它定义为通过传统大众媒体和新媒体展开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区别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

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媒体设备的全球普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地通过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媒体平台得以实现，这使得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个人和组织层面，生活在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主要是通过媒体，一方面获取其他区域文化的信息，另一方面向其他文化区域传递自己的信息。跨国传播的电视和网络资讯让我们足不出户即可了解甚至体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跨国公司或组织则通过不同的媒介载体发布海量的广告信息，实现其跨越文化或国家边界的市场占有或影响力提升。

在国家层面，跨文化传播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纷纷意识到文化产业在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传统产业不可替代的优势。于是，一场争夺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文化产品以好莱坞电影为标志挺进全球，为美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华尔街日报》2010年7月31日的报道，好莱坞电影的海外票房销售在规模高达320亿美元的全球电影市场中已占据近68%的份额。好莱坞电影成功的秘诀正在于其内容和形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对于国家而言，跨文化传播不仅可以创造巨额的外汇，而且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媒体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受国家利益和文化的影响，倾向于塑造自己的积极形象和敌对或竞争国家的消极形象，以此提升自己的魅力和话语权，同时削弱对手的影响力。因此，当代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通过跨文化传播解释自己的立场、辩护自己的利益，争取其他国家政府



和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国家通过跨文化传播对“软实力”的追求,已成为当今信息时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显著现象。

从文化本体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不断丰富自己、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自我封闭的文化必然走向衰落和消亡,这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相反,从中国的汉唐盛世到欧洲的近代崛起、再到美国的后来居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了跨文化传播的创新威力。

当然,在终极意义上,我们期待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最终为人类缔造一个文化多样性和普世性并存的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和谐世界。而这一人类文明的美好愿景,最终也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永不懈怠的跨文化传播来一步步实现。

跨文化传播的上述以及更多重要意义,注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必将成为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显学。

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做出令学界瞩目的贡献。

孙有中

2012年5月27日凌晨于多伦多

简介

英汉新闻编译是中国媒体向国内受众介绍国外信息的重要方式。遗憾的是,过去无论在新闻研究领域还是在翻译研究领域,新闻编译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立足于对译文的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的分析。但是,对文本的封闭式研究,无法洞悉新闻文本及新闻编译文本中隐含的社会因素。在编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特定文化规范的影响以及特定社会的叙事逻辑的制约。新闻编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文化的阐释和意义建构。同时,英汉新闻的编译者既是新闻源文本的解码者,又是新闻译文的编码者,甚至在跨文化传播中拥有一定的道德评判话语权。因此,他们对编译新闻的建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目标受众对“他者”和“我者”的认知。

本书以美国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以及《参考消息》的相关编译新闻为对象,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探讨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叙事方面的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从理性重构的角度分析译文的叙事策略,评价叙事策略引导目标受众建构“我者”与“他者”的效果。

美国媒体在讲述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故事的时候,因为受到其传统元叙事的影响,往往夸大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夸大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新闻事件,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个需要美国进行道德教化的“他者”形象。这一点与过去许多学者呈现的“美国媒体里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本书强调的是,这种“他者”形象并未囿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受到了美国社会元叙事的逻辑影响。同时,美国当代元叙事的嬗变也使这种“他者”形象更加复杂和多面。

当遭遇美国媒体的强势话语时,《参考消息》没有按照传统翻译标准“信”来进行文字转换,而是针对美国媒体的话语偏见采用了选择性建构、时空建构、参与者重新定位建构和加标记建构等再叙事策略。比如,重构北京奥运会的故事,在转述“他者”如何看待“我者”的故事时保留一定的事件诠释权。编译者不再是隐身的语言转换者,而是成为积极的意义建构者和文化阐释者。



About the Book

News transediting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ntroducing foreign news to Chinese readers. The study on news transediting, however, has thus far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either journalism studies 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most conventional methodology deals with such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as free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which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 structure only without taking readers' reaction or historical contexts into consideration. Transeditors, influenced by certain cultural and narrative norms, construct meanings as well as rendering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put it succinctly, transeditors are both decoders and encoders of the messages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As encoders, transeditors wiel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readers' perception of "self" and "others", and have much say in moral judgment.

By examining the transedited news from *Reference News*, a publication by Xinhua News Agency which includes translated articles from abroad as well as news and commentary by senior reporter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narr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media and Chinese media.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comparison, the research expounds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context that influence the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in constructing "self" and "other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ome American media, bounded by their meta-narratives, tend to exaggerate the negative stories about China, thus building a rather weak China that needs to be enlightened by western civilization. Whereas this finding conforms to the previous imagologie studies over the evolving images of China, this study extends earlier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ld-War mentality to the dimension of meta-narratives in America, and the intricacy and complexity of China's imag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of American media, *Reference News* oversteps the norm of translation, and adopts such strategies as 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 framing by labeling, and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to re-narrate the stories of China. In this way, the transeditors not only inform the target readers how the “other” perceive “us”, but also play a vital role in constructing meanings and interpreting cultures. While the research is in favor of the salient role of transeditors, the author also argues that the transeditors’ discourse power in re-narrating stories should not be abused in that not all the negative stories are prejudice or distorted.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新闻叙事与新闻编译的整合	22
第一节 叙事学的演进路径	22
第二节 作为叙事的新闻	23
第三节 作为再叙事的新闻编译	34
第三章 美国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的叙事策略	46
第一节 美国媒体的文化背景	46
第二节 美国媒体的北京奥运会叙事	56
第四章 《参考消息》的再叙事策略	76
第一节 《参考消息》编译新闻与美国媒体新闻原文对比	76
第二节 叙事的竞争：编译新闻的再叙事策略	88
第五章 美国社会元叙事与美国媒体叙事	142
第一节 元叙事的概念及特征	142
第二节 美国的历史元叙事与当代元叙事	144
第三节 中国社会元叙事与中国媒体叙事	153
第四节 英汉新闻编译：后殖民语境下的叙事思考	166
第六章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90

第一章 导论

纵观历史长河,叙事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从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到清代弹词、鼓词的民间说唱,从影响西方文明发展的荷马史诗到好莱坞电影对英雄主义的演绎,叙事以神话、绘画、杂文、会话、童谣、电影等多种形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到了20世纪中叶,叙事学才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当每天的新闻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新闻这种非文学文本也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叙事形式之一。作为叙事者,记者们运用语言系统的规则、按照一定的逻辑将新近发生的事件整理加工,并且利用媒体传播这些被编码的故事。同时,还有一些谙悉多种语言的叙事者,将全球各地发生的故事进行二次编码,在另一种语言受众中转述远方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每天非常熟悉、但很少探究的新闻编译。在信息无疆界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种再叙事的重要形式,新闻编译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容,而且通过不同的叙事角度、不同的时序安排对故事进行诠释。

如果比较宽泛地分类,过去新闻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的效果、大众文化批判和话语分析等领域。以传播效果为目的的实证研究将新闻视作客观的事实存在,客观事实是其关注的核心;大众文化批判和话语研究等领域则将新闻视作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实证主义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中以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与新闻媒介对这些事件的展示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20世纪60~90年代的新闻研究表明,媒介及其对这个世界的描绘设定了公共议程。^①按照这一逻辑,媒体尽管可能无法改变受众对某些事件或者问题的观点,但是可以引导受众关注某些事件。麦库姆斯等学者提出的这一假设的关键在于:是不是那些上了头版头条的新闻就一定能影响公众的观点?是不是某一时期内集中报道的新闻就一定能影响受众的认知?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学者艾英格(Iyengar)曾经做过一组试验,将有关美国环境污染和失业这两个社会问题分别按照生动的写法和平铺直叙的写法写成了不同版本的新闻,然后让参加试验的受众在阅读后进行评价。^②测试表明,不同叙事方式

^① [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② Donald R. Kinder and Shanto Iyengar, *News That Matters: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63.



议程设置的效果有强弱之分。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新闻进行效果研究，固然能减少研究者的主观性，并且大量的新闻数据有利于总结规律，但不可避免地遗漏特例，且缺乏深入的辨别与分析。新闻技巧在于如何讲述故事。

新闻研究的另一个关注是大众文化批判视阈中的新闻。早在 20 世纪中叶，文化工业中的新闻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对象。之后，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符号学派对新闻影像和电视节目进行解构，从符号学的角度关注新闻如何建构现实。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霍尔(Stuart Hall)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文化模式对新闻的影响。李普曼认为，新闻并非原始资料的忠实再现，而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叙述。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化下的新闻记者早已被灌输了“正确的”叙事方式，他们的报道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与霍尔一样，嘉尔顿(Galtung)和卢吉(Ruge)认为“新闻实际上是老套的旧闻”。^①他们还指出，在衡量某事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时，记者倾向于报道精英人士、强大国家和负面事件，因而新闻是具有偏见的。批判新闻偏见的学者还包括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盖奇·塔其曼(Gage Tuchman)等。从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揭示新闻生产和使用不啻为新闻研究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每天的新闻是新瓶装旧酒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那么记者们是用了什么样的“新瓶”让受众不厌其烦地消费“旧闻”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媒体有不同的逻辑和范式，那么，国际新闻又如何在不同受众间流通？

近几年，新闻话语分析备受推崇。不少国内学者以荷兰学者范·戴克提出的新闻语义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新闻图式(news schemate)为核心概念，研究新闻的特殊结构和组织形式。毋庸置疑，范·戴克提出的话语分析模式为新闻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亦有不少学者对静态的结构分析产生质疑——话语分析的弊端在于，研究者容易陷入静态的结构分析，只重视语言微观层面及文体内部结构的特点，忽视了话语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宏观话语。此外，随着新闻写作形式日益多样化，“倒金字塔”式的写作优势不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由宏观语法组织起来的新闻宏观结构已无法解释所有的新闻写作现象了。

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人类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而且在所有行为、实践中都是讲述故事的动物”。受此观点的启发，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沃特尔·费舍尔(Walter Fisher)提出了“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的概念，并以这种叙事范式作为理解人际传播的基础。在费舍尔看来，世界上的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90 页。

一切都是以某种叙事形式有机地串联起来的,正是因为特定的叙事形式和抽象的原则,规定和观念才深入人心。过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人际传播是以论辩的形式进行的;而费舍尔的叙事范式则认为传播更多的是文学、审美与论辩的综合。费舍尔所谓的叙事是一种符号行为理论,人类通过有序的和有意义的文字或行为,对生活在这些文字或行为中的人、创造这些文字或行为的人以及阐释这些文字或行为的人产生影响。费舍尔强调,叙事不仅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关,也与真实的世界相关。^① 费舍尔的叙事范式将文学意义上的叙事运用到了非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从哲学角度为叙事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费舍尔的范式包括三个方面:叙事的忠实度,或者叫故事与现实的联系;叙事的可能性,或者叫故事的内部连贯性;叙事的好理由,或者叫故事的价值。^② 一个故事具有好理由非常重要,正是好理由或者好价值观让受众觉得故事真实可靠;如果一个故事具有可信性,它也就会构成受众的某种信仰或行动的好理由。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费舍尔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对新闻文本研究的一点启示:传统的理性范式建立在认识论或者在人们已经形成的知识结构之上,这就意味着等级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所有大众都在某些专业领域拥有专门知识。所以,在这个范式下,一些人拥有话语的裁判权和领导权,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相比之下,叙事学范式的哲学基础是本体论(ontology),或者叫已有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③ 这种范式的优势在于,每个普通人都有参与意义建构的公平机会。只要叙事的结构紧凑,逻辑严密,就能使受众相信并且拥护故事的意义;即便是故事中充满了令人质疑的价值观,受众们也不一定能立刻觉察出谎言。如果从费舍尔叙事范式去理解叙事的功能,叙事可被看作建构意义的、有效的言辞工具,能够让更广泛的普通大众参与意义的建构,为特定的文化群体提供情感上的纽带、共享的价值标准和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费舍尔叙事范式的某些理论基础与前面提到的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的仪式观有些不谋而合。

美国菲尔莱·狄更斯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传播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卡尔蒂诺在《危机事件的叙事:费舍尔的叙事范式与新闻报道》一文中,以费舍尔叙事范式为基础,以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1995年俄克拉荷马爆炸案、2001年“9·11”恐怖袭击这三个危机事件为对象,归纳了美国几家主流新闻杂志新闻叙事的模式。卡尔蒂诺总结出危机新闻中五种叙事

^① Walter R. Fisher, “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for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84, Vol. 51, pp. 1–21.

^② Walter R. Fisher,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p. 109.

^③ See ①, p. 4.

类别,而且证明这五种类别是按照先后顺序在新闻中出现的,它们分别是:个人或集体叙事,替罪羊叙事,预防措施叙事,展望未来叙事,反思叙事。^① 卡尔蒂诺认为这五种叙事类型能够为受众建构起危机事件的框架,而且这些框架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共性,从而可以在一定文化群体内建构归属感。卡尔蒂诺运用费舍尔范式对叙事进行了类似框架的种类区分,但对于新闻人员运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呈现这些框架语焉不详。

不管是原创的新闻还是经过编译后进行二次传播的新闻,其本质都是再叙事。诚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所言:“《纽约时报》曾经只是作为记录的报纸,现在读者们可以在阅读该报时发现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新闻尤其是面对来自新媒体竞争压力的传统媒体新闻,愈发注重写作技巧,不仅关注故事内容本身,而且关注如何讲述故事。叙事学中的潜文本(subtext)、视角(focalization)与叙述(narration)、叙事者(narrator)、叙事文类(genre)、叙事时序(sequence of events)等核心概念便于从文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维度细读和阐释文本。当然,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新闻文本并非要否定其他研究方式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事实上,以后经典叙事学为主要思路和框架、结合文化的批判视野、运用话语的分析工具,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新闻。

知名文学评论家、叙事学家玛丽—劳里·瑞安(Marie-Laure Ryan)收集了众多学者对媒体的语言及非语言叙事的研究论文,以此表明后经典叙事学越来越认可新闻叙事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文学叙事的研究工具亦可为新闻叙事借用。在瑞安的著作面世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新闻与叙事的关系。但大多以叙事之名行新闻话语分析之实,甚至有人对新闻与叙事两个概念的“联姻”还心存疑虑。

丹·贝尔克韦兹主编的《新闻的社会意义》一书收录了伊丽莎白·贝尔德和罗伯特·达登撰写的《神话、编年史和故事:探索新闻的叙事特征》。^② 这篇文章明显深受詹姆斯·凯利的仪式观的影响,否认新闻的传播(transmission)模式。他们认为,新闻等传播活动并不是信息在空间的扩展,而是社会在时间上的维持;不是信息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表现。他们认为,应当把“软新闻”、“硬新闻”视作一种符号系统,与其说是告知人们每日发生的事件,不如说是向受众提供一个共享社会仪式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就跟神话、民间传说一样,告诉生活在特定文化里的人群什么是善、恶、美、丑。人们每日阅读新

^① Christopher T Caldiero, “Crisis Storytelling: Fisher’s Narrative Paradigm and News Reporting”,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Spring 2007, Vol. 9, p. 2.

^② Elizabeth S. Bird and Robert W. Dardenne, “Myth, Chronicle and Story: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News”, Dan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330–350.

闻就如同参与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每天新闻所报道的人名、数字、事实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报道的框架、符号系统是永恒的。总而言之,这两位学者认为,新闻文本如同仪式、艺术、游戏或者其他符号形式,带有鲜明的文化标志,在某种文化的模式下被编码用以指导人们的言行。此外,有的新闻人员可能隶属于边缘的文化群体,因而他们所接受并使用的新闻叙事技巧与主流文化的叙事技巧可能大相径庭甚至相互抵触。

专门研究叙事与新闻的关系的国外学者并不多见,美国学者罗纳德·雅各布斯应当是其中成绩斐然的一位。雅各布斯在《制作新闻,制作危机:叙事、电视和新闻》一文,中以翔实的论据证明了叙事理论运用于新闻研究的合理性。^①雅各布斯认为,20世纪50~60年代比较常见的定量研究或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容易忽略新闻制作人的意图,忽略新闻传播中的扭曲现象以及新闻机构本身扮演的角色。70年代的学者普遍认为,新闻话语结构对受众施加了霸权的影响,新闻文本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维护主流文化的支配权力。总之,这一时期学者们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文本,包括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这种被雅各布斯称作“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将阐释文本意义的权力都赋予了文化研究者。而第三类学者(包括塔其曼、甘斯等人)则坚守雅各布斯所说的“机构主义范式”,尤其关注记者如何组织信息,如何与各种官僚及新闻来源打交道等新闻机构的工作实践。如果说结构主义范式的弱点是忽略了人的作用,机构主义范式则忽略了新闻制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大众话语的关系。此外,雅各布斯亦对纯粹的受众研究模式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方式过于机械,忽略了文本和话语本身。在有关受众的研究上,雅各布斯赞同罗兰·巴特的观点,认为文本的解读的确由受众的解码实践决定。面对文本就如同面对很多条分岔路,不同的解码实践使受众选择某一条路而放弃其他;但是新闻制作者有一定的操控能力,可以引导受众采取某种解码方式而放弃其他方式,或者采取对文本的某些特征进行强编码(*overcoding*),而对另一些特征进行弱编码(*undercoding*)。

雅各布斯认为,从叙事的角度关注新闻可以兼顾新闻制作、新闻结构、新闻价值、受众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研究方式的不足。首先,新闻人员不仅讲述故事,而且通过故事诠释整个世界。这种本体论叙事是新闻制作的核心。其次,叙事贯穿于新闻形成和使用的全过程:从新闻的接受层面上看,新闻为受众建构可以共享的经验,并影响新闻的新闻价值;从内容层面上看,叙事提供一定的规范、风格和文学原型;在新闻制作层面,叙事可以影响到新闻的演绎

^① Ronald N. Jacobs, "Producing the News, Producing the Crisis: Narrativity, Television and News Work",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96, Vol. 18, pp. 373–397.



(enactment)。

雅各布斯借用诺斯鲁普·弗莱(Northrup Frye)的“原型叙事模式”(archetypal narratives)——即喜剧、浪漫剧、悲剧和反讽剧——来说明事件如何被情节化、最终形成叙事的。雅各布斯运用文学意义上的原型叙事模式分析《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前哨报》对罗德尼·金惨案的报道生动展现了不同媒体的新闻人员如何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情节化、使之成为可以叙述的故事以及新闻事件在特定叙事文类中如何被戏剧化。

在讨论新闻叙事时,雅各布斯强调了媒介事件(media events)和常规新闻(routine news)的区别。他认为,总统大选、皇室婚礼、世界杯赛、危机事件、暴力冲突等事件属于媒介事件,而其他则是常规新闻。媒介事件通常缺乏喜剧和反讽剧两种原型叙事。让受众在消费媒介事件时,通过新闻这个平台参与故事的“仪式”、共享文化符号,才是制作此类新闻的重要意图。

卡伦·约翰逊—卡迪是另一位研究新闻与叙事的美国学者。在《新闻叙事与新闻框架:建构政治事实》一书中,他对费舍尔叙事范式做了详解,并且借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写作观点讨论了新闻叙事与新闻框架的关系。^①由于框架这一概念更多地涉及认知模式,所以约翰逊—卡迪在分析新闻叙事时也更注重从新闻人、受众等不同角度剖析叙事储备(repertoire of narrative forms)。叙事者和叙事接受者头脑中贮备了一定的叙事,所以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叙事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有了叙事储备,记者们能迅速将复杂的新闻故事浓缩成浅显易懂的事件进行报道,受众也能容易地解读新闻故事。以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讲为例:总统就职演讲标志着党派竞争的结束、国家团结的开始,因此,总统的话语应当体现从某一党派胜利的代言人到全美人民领袖的过渡,当然,其中还包括对失败者的宽慰(healing rhetoric)。总统就职演讲的写稿人、新闻记者以及公众其实在演讲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常识,所以总统的演讲无非是按照公众以及媒介的期望履行一次仪式而已。对于报道该仪式的记者来讲,无非是按照公众过去的期望、将一定的社会角色、事件组织起来而已。当记者组织这些素材进行叙事的时候也是轻车熟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储备了各种叙事框架,约翰逊—卡迪称之为“原型”(archetype)。在什么语境下怎样叙述?原型可以为记者提供成熟的模式。除了总统竞选这样的原型故事外,灾难离散亲人、白手起家、个人主义、恶毒后妈等原型都是同时在记者和读者的头脑中储备着的。

约翰逊—卡迪认为,否认“新闻即叙事”就是否认作者身份;而否认作者身

^① Karen S. Johnson-Cartee, *News Narratives and News Framing: Constructing Political*.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p. 147–176.

份实际上就是故意淡化新闻中意识形态的力量,这样不仅将新闻与普通叙事区分开来,而且掩藏了价值观的起源和表现形式。他认为,大部分美国记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叙事中有明显的文化霸权痕迹。他还指出,尽管先前经验使叙事行为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但正如人类其他活动一样,叙事规则也会在一定情况下被颠覆、被破坏。

除了以上几位美国学者外,在新闻与叙事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的还包括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伊萨克·罗伊(Itzhak Roeh)教授。他在《美国行为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故事的新闻,作为叙事的报道》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关注新闻与叙事。^①他的观点更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首先从他引用柏拉图的话开始:“法庭上的言辞意欲产生的并非真理本身,而是给人以貌似真理的印象。”^②罗伊认为,对逼真性的追求使话语表达力求实现让事实本身说话,所以新闻记者所使用的语言无非是客观性的修辞。换言之,记者们所谓的客观报道无非是一种修辞,是想让受众在读到、听到新闻的时候认同“这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罗伊同时强调,新闻故事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发生,而不同语境的文化群体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理、什么具有讲述的价值界定不一。每一个故事——包括新闻故事——在被讲述的时候,语境可能完全不一样,同一个故事再次被讲述时就必须重构语境。从罗伊的观点可以推出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故事版本可以成为唯一权威的故事叙事。

罗伊认为,可以从功能和文体两个层面上理解为何新闻是一种叙事。实话实说(telling it like it is)无非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新闻与普通的故事一样,经过了被加工、解码、感受等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的制作者和使用者都有着复杂的认知、移情等心理过程。新闻制作人从他人身上领会某种经历,然后通过文字等形式唤起使用者的感情;使用者则通过消费新闻获得他人的观点、同他人共享某种情感或经历,犹如参与某种象征性的仪式。其次,文学意义上的写作风格亦可运用到新闻写作中。不同的新闻故事可以使用不同的写作风格,但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同类新闻故事的互文性。比如,通常流行小报的新闻写作是以浪漫剧(romantic)和情节剧(melodramatic)为主,而读者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的主流大报则多以反讽(irony)为主。罗伊认为,将新闻放在叙事的视阈中研究好处有二:可以借用文学分析的工具研究新闻;一旦新闻被界定为叙事,那么新闻文本和语境就会产生差异和可比性,甚至产生竞争——这为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① Itzhak Roeh, “Journalism as Storytelling, Coverage as Narrative”,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89, Vol. 162 – 168.

^② “It is the impression of truth, rather than truth itself, that rhetoric in the courtroom tries to produce.”